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家选集丛书

傅斯年



傅斯年选集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岳玉玺 李 泉 马亮宽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傅斯年选集

岳玉玺 李泉 马亮宽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5插页 310千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137-0/Z·48

定 价：26.00 元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F063/11

编者前言

傅斯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他曾叱咤风云，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此后，他潜心古史研究，在先秦史、哲学史和考古学领域均成果斐然。他还主持史语所工作多年，组织力量整理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发掘殷墟，为抢救和保护濒临散失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30~40年代，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傅斯年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又投身到救国救民的社会活动中，留下了不少政论文章。同时，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深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因而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有些观点甚至在我们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里，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傅斯年的名字一直湮没无闻，即使偶尔提及，也是当反面角色对待，他的文集的出版就更无从谈起了。

应当承认，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阶级立场的局限，尤其是他把国家的前途寄托于他认为虽“误了国家大事”却仍可“改进”的国民党政府，使他在某些政论、教育类文章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攻击中国共产党、曲解中国革命的看法，视共产党为外国进来的“邪教”，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是犯罪，国民党垮台、大陆解放是一场给中国前途带来灾难的“赤祸”。诸如此类表明，他对共产党是存有偏见的，读者对此须有清楚的认识。

以他的能力和声望,他足可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阁僚,但他一直没有入阁,没有出任蒋介石想让他担任的国民政府委员之职,而是以在野身份为社会的进步奔走呼号。他是在空想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着奋斗,指望通过自己以局外人的地位促使腐败没落的国民党政权有所更新。实际效果自然是落空了,而他追求个人的独立性,不愿成为蒋氏政府中一员的立场,则值得我们深思:他的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在于救国救民,而非其他。我们对他应有一个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本书共收入傅斯年的文章 31 篇(其中有 3 篇系节录),内容分为思想文化、历史、政治、教育等四类。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上起 1918 年,下迄 1950 年;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和主要学术成就。

陈 益 民

1995 年 9 月



傅斯年 像

目 录

傅斯年先生思想学术述评·····	(1)
文学革新申义·····	(23)
文言合一草议·····	(33)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40)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48)
《新潮》发刊旨趣书·····	(56)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60)
性命古训辨证(节选)·····	(68)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145)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74)
考古学的新方法·····	(184)
史学方法导论(节选)·····	(192)
史记研究参考品类·····	(232)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235)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	(237)
夷夏东西说·····	(247)
《城子崖》序·····	(293)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	(297)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	(305)
万恶之原·····	(307)
破坏·····	(312)
一段疯话·····	(314)
陈独秀案·····	(317)
上蒋介石书·····	(324)
至胡适书·····	(329)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334)
教育崩溃之原因·····	(341)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347)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352)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节选)·····	(358)
论学校读经·····	(371)
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376)
附录:主要著述年表·····	(380)

傅斯年先生思想学术述评

傅斯年先生(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市人。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及文本科国文门。毕业后遂去英德留学深造,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治历史、相对论、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等科。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由于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方面均获得了显著成就。他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一位著名学者。

傅先生出身儒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自幼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基,入北京大学之后,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的器重,把他作为国学的继承人加以培养,他学习特为努力,很快便成为大师们的得意高足。正当此时,一场震荡我国思想与学术界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他所在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为这场运动的惊涛骇浪所摇曳,他从旧国学的故纸堆中惊醒,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影响与引导下,他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并拿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使他一变而成为一名新文化运动的勇猛斗士。

从1917年秋开始,他不断地与其同学挚友们一起谈论创建学生学术团体的问题,经一年的酝酿,“新潮社”正式成立。该社的刊

物亦名《新潮》，他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潮〉发刊旨趣书》说，他们办刊的目的是“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为《新潮》规定了四项任务，一是“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之自尊心”；二是为中国人“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三是“鼓励学术上之兴趣”；四是使全国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强调，《新潮》的特色是“以批评为精神”，提倡标新立异。不难发现，他的这些主张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的主旨，是极为一致的。不过，在当时的一般人看来，《新潮》似乎更为“放荡不羁”，无所顾及，它在青年特别是学生中，引起了更大的同情。《新潮》编发了大量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论文、文学作品及译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方面军。

在“五四”前后的两年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 54 篇作品，其内容涉及甚广，都是投向封建营垒的炮弹。这两年是他一生中思想最为活跃，最为激进，写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他从旧国学中挣脱出来，深谙其病痼底细，因之，他对中国旧学术的分析与批判是一针见血，颇中的鹄的。他指出，中国旧学术有七大误谬：“学派以人为本”，“人亡学息”；治学以引述前代圣贤的话为天职，而“不认个性之存在”；立论务求其能“被之四海”，“放之古今”，却“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只顾高标“己之所肆”，而轻视其他学派；“好谈致用”，但止于空谈，因而“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重形式而不管精神”，“千篇一面，一同而无不同”。他以为，纠正这些误谬的方法是用大胆的疑古精神，即对古代的东西“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他十分看重疑古精神，认为只要有了它，便可“作范后昆”，开一代风气。他主张，治学应以“条理为先，发

明为要”，不能“罗列群书，多所抄写”，着重阐发自己的思想见解。他认为，新派人物对旧的学术观点，必须持有“征服的决心”，不能调和折衷，不能新旧学术强行糅合成“古今中外党”，那样做，便断难实现“根本的改革”了。他批判中国旧学术的误谬，但并不将它全盘否定。比如，他虽然批评清代的考据学，谓其只向六经中去找“孔二先生孟老爹爹的真话”，误认为孔孟之言就是真理，而不是象西方文艺复兴时那样，去向万事万物求真理，但是，他在批判清代学者的同时，又充分地肯定他们的两点可贵之处：其一是大胆疑古的精神。他说，宋明理学“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使人“探之茫茫，索之冥冥”，把中国学术引进了死胡同。清代学者从绝境之中另寻新径，他们探求真史，“求诸六经”，不轻信古人成说，顾炎武等人疑宋儒，阎若璩等人疑古文，章太炎疑今文，结果导致疑孔子，使“孔子即真理”的信条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他称赞这种疑古的方法，是“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的，这在思想方法上，与宋儒相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其二是亲历实验的态度。他认为，清代学者们讲究“实事求是”，“专求实用”，强调实证，尊重经验，用归纳的方法取得大量材料，仔细研究，求异求同，这种态度和方法，也是颇应取法的。他概括的这两点，对他后来的研究取向及其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大力鼓吹文学革命，犀利地剖析旧文学的弊端，猛烈地反击一切阻碍文学革新的言行。他认为，“文学之宜革而不宜守”，是一个“不待深思而解”的问题。这是因为，首先，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总是“变古者大开风流”，“恒居上乘”，而“循古者每况愈下”，“必成文弊”。这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变动不居，推陈出新”是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因此，即使“今虽无人提倡文学革命，而时势所要求”，文学自身也是“终不能自己”的。其次，从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与学术的关系来看，文学、政治、社会风俗及学术等等，都是“人类精神之产品”，它们又都是“为时势所迫”，“概行变迁”的，

因此，一旦政治、社会风俗、学术发生了变化，文学便“亦应随之以变迁，而不容独自保守”。当时的中国既已“革君主而定共和”，因之，“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的东西，就应一概废止。然而，在当时，却有一些人以保存国粹为名，拼命反对文学革新。傅斯年批评这些人说，你们把旧文学捧上天，谓其“造乎其极，蔑以加矣”，表面看是把它抬得极高，实际上是将它置于“止境”，而止境即为死境，不叫它改革，不叫它发展，就等于叫它在那里死等着其末日的到来。他主张，“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对于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诸种旧的文学流派，傅斯年分别进行了批判，他说：古典主义者“凡所持论”必“动引古人”，他的致命之疾是“舍本逐末”。桐城派的义法是“无适而可”，论言理则“不畅微旨”，论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论纪事则“颠倒天然之次叙”，通篇“造作虚辞”，尽是“戕贼性灵以为文章”。骈文之体，作之“难能”，但实“非可贵”，因为其内容“皆与人生无关，情调又都低下，所以，这种文章“无济民生，不能辅导社会”，故“必须废止”。骈散交错的文体，专尚“风容色泽放旷精清”，“文句牵滞”，“用词浮夸”，足见其“舍本务末”，其形式“简慢舒徐”，其内容“意度格力，固无取焉”，实为“末流文弊”，是很应该“加以剪除”的。傅斯年认为，中国文学革新的阻力，不仅仅在于有保守派的公开反对，更大的危险在于那些表面上改革而内心固守老样不变的人。他从文化心态上揭示此种危险产生的根源说：“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因之，在中国“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皮毛没有不速成的”，但因中国人的“遗传性上有问题”，即传统的思想习俗根深蒂固，所以，“在中国提倡一种新主义的精神很难得好”。他把那些只用白话字眼，但无新思想内容的文章，斥之为徒具“白话的外壳”，不能算做真正的白话文学。真正的白话文学（即新文学），应该用“白话的内心”写出来的。他所说的“白话的内心”是指，“人生的深

切而著明的表现,是向上生活的兴奋剂”,它必须包含三个要素,一要用“白话作材料”,二要“有精工的技术”,三要“有公正的主义”,并且“材料和主义不能相离”,而应“内外相称”,“灵魂和体壳一贯”,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改变”,“必须有精神上的革新”。

二

傅斯年先生向以博学多才著称,但其学术成果尤以历史学最为卓著。从1928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起,他连任所长22年,直至他去世为止。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阐明成立该所的缘由说:“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和灭亡,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的就是物质的原料之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理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置”。他在该文末尾,提出三个口号:一是要与那些将“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严格划清界限;二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三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三个口号,是对史语所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的高度概括。其一是指要继承与发扬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充分利用新旧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并且要扩充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发扬客观务实精神;反对主观臆断,“反对疏通”,反对推论,更不容许假设,应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其二是指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其三是指史语所研究工作追求的目标,即振兴中国的学术,使中国的历史学与语言学以其独特的风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史语所的学者们经22年之努力,获得了丰硕成果。首先,他们对清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进行

了抢救与初步整理,编了简目,并以集刊、单刊、专刊等形式出版了不少资料与专著,同时,他们还整理校勘了《明实录》,搜集并整理了敦煌卷子,对汉魏竹简作了整理与研究。其次,在傅先生的领导与组织下,史语所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不仅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确立了辨别世传甲骨文真伪的标准,而且为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不仅使商代的历史面貌由暗转明,使中国的信史向前提了数百年,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殷商奴隶制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三,傅斯年摆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专家,运用科学的工具和实验的方法对中国的语言展开研究,对南起两广,北至河北,东起苏闽,西迄川陕的14个省区,作了广泛的调查,又对边疆地区的许多少数族的语言进行了采集,多数调查作了录音,并在南京的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由于史语所专家们的努力,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得以确立崛起。其四,遵照傅斯年使用直接材料,搜求新材料的原则,史语所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在广泛范围内展开。他们先后对广西的瑶族、湘西的苗族、台湾的番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的畲族、云南的傣族以及云贵、四川的古羌戎等族作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体质、文物、风俗、制度等项。同时,又对殷墟出土的殷周时期的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分析。这些工作,在我国民族学与古人类学研究史上,都是具有开创之功的。其五,史语所通过其工作的实践,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后来在大陆和台港颇获学术声望的陈寅恪、李济、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夏鼐、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胡厚宣、梁思永、郭宝均、石璋如、陈乐素、陈述、劳干、严耕望、全汉升、凌纯声、丁声树等,都是曾在史语所工作过的。

傅斯年先生虽在北大读书时就已开始对史学与文学进行了学术探讨,而且发表过不少见解,但是,他真正集精力于史学研究,是

他回国以后的前十年，即 1927 至 1936 年。这十年，他先后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考古学的新方法》、《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并撰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辨证》、《东北史纲》等近二十篇史学论文及学术专著。在这些论著中，他对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古代学术史、先秦诸子、古代文献、古代文学史等，均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其一些论著中，清楚地表述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从而使他以一位独具特色的史学家的资格，自立于中国史界。

傅先生青年时期就盛赞疑古精神，但他却没有加入疑古派，而是运用自己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稽古钩沉，于古史建设上着力，创获甚丰：1. 他由商文化发展的高度而推论，认为“夏后氏一代之人必然存在”，而且，“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重要一脉”。他考察古民族斗争情况后，证明在有夏一代，全是夷夏东西之争。2. 他以《诗经》、《山海经》、《楚辞》等古文献为据，得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的结论。他是商族起源东北说的创始人。3. 他稽查古籍，证明周族起源于西戎，与姜姓同为羌族的一支。他认为世传的“隆周贬纣”的故事，大不可靠，周灭商不是文明取代野蛮，而是落后的部民战胜了文化较高的部落。他认为，商纣不是一位暴君，而“是一大英雄”，他之所以亡国，是因“民疲不能尽为所用”。4. 他不同意郑玄对“大东小东”的解释，认为大东小东是地区名称。大东指泰山以南、以东地区，小东指今之河南、山东交界一带。据此，他对周代的鲁、燕、齐的封域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三国周初的封域都在成周之东南，而后才迁至今之山东，河北。5. 他对周代的诸侯国的爵、姓及地望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之后说，周代的公、侯、伯、子、男五种爵名，既无等差可言，亦无所谓班列，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6. 他对先秦时期的古老民族

的由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夷族居于淮、济下游，古籍中的太皞、少皞均属夷人；秦赵的祖先皆为嬴姓之夷人，商代向西开拓疆土时始西迁。他认为，戎狄最初为方国之名，后来才渐渐成为西方民族之泛称。楚为祝融氏之后，祝融氏在上古曾是一强盛之部族，夏商周之时，大量南迁，留居中原者唯“黎”部落。7. 为反击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他邀史学界同仁合撰《东北史纲》一书，他亲自写了第一卷，在卷首“引语”中说：“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就此二三十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当然，傅先生关于先秦古史的研究，是存在不少缺点的，他的某些结论也有欠妥之处。但是，他在研究中，注意吸收新材料，选用新方法，特别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大胆地引入史学领域，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并加以发扬的。他不拘于前人旧说的探索求新精神，更是值得称许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傅先生亦著力颇勤。他写《战国子家叙论》，对儒家、老庄、阴阳学派、政论家、稷下学派、杂家等都作了研究与分析；他的洋洋大作《性命古训辨证》，以“性”、“命”二字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天命观、人性论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缕述分析。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讨论思想史的问题时，十分重视“物质的凭借”，认为思想意识皆有物质的条件为依托。比如，他在揭示战国诸子并兴竞起的原因时，从书写工具的进步、政治社会的混乱、民族的融合及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入手；他在析理诸子的思想时，强调其地域、时代、职业诸因素。这使他的论点颇得坚实可信之效。由是观之，他虽然一向不赞同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但却在此处不自觉地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可以用他常说的三句话来加以概括，